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 剑 李 灿 (什 邛 市 博 物 馆)
雷 雨 冉宏林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2019年11月4日至11月5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什邛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四川什邛市召开。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为主题，并就古蜀文明的保护传承展开全方位深入讨论，议题涉及桂圆桥遗址及相关古蜀文明遗址的发现、发掘与重要意义、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聚落考古工作与研究以及科技考古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硕。为开展桂圆桥遗址今后的考古工作、研究、保护以及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路和中肯建议。

关键词：桂圆桥遗址；文化交流；聚落考古；科技考古

Abstract: The academic seminar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Discovery of the Guiyuanqiao Site was held in Shifang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November 4 to November 5, 2019, by Sichu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Shifang Museum. Nearly 100 experts and scholars gathered to commemorate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of Guiyuanqiao site, having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The discussion content of the conference is as follows: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Period I and period II of Guiyuanqiao site,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three periods are the same and belong to the same cultural system. The remains of Period II and Period III are obviously similar to those of Period I of Sanxingdui site, belonging to Baodun cultur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Guiyuanqiao site acts as a bridgehead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Firstly,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rooted in Sichuan Basin, had close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surrounding areas, although it is blocked by mountains. These frequent cultural exchanges may even be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The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and other cultures, carried and presented by concrete objects, is merely a representation, the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of ideas and consciousness is much more important.

Secondly, although settlement archaeology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30 years, due to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roblems are still unsolved. What’s more,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xpose a settlement completely in pres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y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and nature of the settlement inevitably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blind men and an elephant”. However, the settlement archaeology of Baodun site and Sanxingdui site seems to have found solu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Both of them pay more attention to linear relics such as walls and trenches, dividing the functional areas of the settlement accordingly, focusing on the overall date, nature and changes of the functional areas. These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will undoubtedly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study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in the future.

Thirdly, research on human skeleton in Gaoshan ancient city site and pla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uch as wood identification in the cemetery of Shuangyuancun site indicate that more and more new technique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These new contents provide unprecedented new information, new ideas and new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In summary, this meeting provided many useful ideas and pertinent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archaeological work, research, protection of Guiyuanqiao sit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Project.

Key Words: Guiyuanqiao site, cultural exchange, settlement archaeolog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rchaeology

桂圆桥遗址于2009年4月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同年5月至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博物馆、什邡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1]由于桂圆桥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文化面貌与宝墩文化有明显的承袭关系但又有所区别,发掘者因此将遗址第一期遗存命名为“桂圆桥文化”。^[2]桂圆桥遗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搭建起川西北地区以营盘山、姜维城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之间的桥梁,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平原早期文明化进程、聚落与社会变迁等研究,^[3]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值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之际,为更好地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由四川省文物局指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旅局、什邡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协办,什邡市文体广旅局、什邡市博物馆承办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4日至5日在四川什邡市隆重召开。来自省内外文博单位、大学和新闻媒体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主题及讨论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 桂圆桥遗址及相关古蜀文明遗址的发现、发掘与重要意义

自三星堆遗址于1929年首次发现以来,与古蜀文明有关的遗址陆续面世,桂圆桥遗址、宝墩古城、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和马家战国大墓等重要发现更是轰动全国。这其中,桂圆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寻找古蜀文明的源头提供了迄今唯见的重要线索。

在遗址发掘整整十年之后,主持和参与发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雷雨研究员以“十年一剑——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与发掘、保护及研究历程回顾”为题,回首往事,重现当时的发现、发掘过程,重申桂圆桥遗址的重要意义,并系统规划桂圆桥遗址未来的发掘、整理、出版和

研究工作。

什邡市博物馆杨剑副研究员则立足桂圆桥遗址,系统梳理了什邡市境内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末期古蜀文明遗址的分布位置、工作开展、内涵特征及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殿增研究员进一步从三个方面指出什邡在古蜀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 (1) 什邡是古蜀文明进入成都平原的第一站;
- (2) 什邡是古蜀文明与汉文化融合的终点站;
- (3) 什邡可能是古蜀国唯一留下文字名称的地方侯国。

尽管如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智彬研究员所说,桂圆桥遗址第一期遗存和第二期遗存之间尚有缺环,但与专家一致认为三期遗存文化面貌一脉相承似无疑义,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第二期遗存和第三期遗存明显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相似,属于宝墩文化。如此,早于第二期遗存的第一期遗存即是现今成都平原最早且与古蜀文明有密切渊源关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其测年数据为距今5100年至4600年。毫无疑问,桂圆桥遗址充当着探讨古蜀文明来源的桥头堡的角色。

二 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

植根于四川盆地的古蜀文明,尽管与周边区域有高山阻隔,但一直以来都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4]这些频繁发生的文化交流甚至有可能是古蜀文明形成的重要原因。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剑研究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娇副研究员均认为桂圆桥遗址的部分文化因素来源于川西北地区。其中陈剑研究员从器物特征、信仰习俗、生业形态以及年代关系等多方面论证桂圆桥遗址处于营盘山遗址和宝墩遗址之间的节点地位,更详细勾划出川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进入四川盆地可能存在的四条路线:(1)沿涪江源头及支流火溪河,经平武县城进入盆地腹心;(2)沿土门河(湔江),经茂县、北川县、安县、江油市一带进入盆地;(3)沿岷江干流,经汶川县、都江堰、彭州市抵成都平原;^[5](4)从茂县翻越九顶山直接进入什邡所在的成

都平原。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古蜀文明不仅在形成阶段受到外来影响，在发展、繁荣时期也与盆地外的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封口陶盃、铜尊、铜牌饰、玉璋、玉戈等均是重要见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田剑波馆员则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圆眼直喙歧冠鸟形饰入手详细论述了包括古蜀文明所在的四川盆地在内的长江中上游地区与秦岭南北的文化交流。

上述以具体实物为载体展现的古蜀文明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只是表象，实质还在于观念和意识的交流互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映福教授就指出，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其以美玉和黄金表达王（神）权的价值体系的形成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以玉琮表达王权的观念源自良渚文化，以璋、钺等玉器表达王权的价值观念源自中原地区，而以黄金等贵金属表达王权的观念则源自西亚地区。无独有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德安研究馆员在综合考察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寓意太阳的诸多祭祀器物之后，也认为古蜀文明日神崇拜的宗教意识源自长江中游地区。

回顾以往关于古蜀文明与其他文化交流互动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器物特征对比并由此作适当的延伸讨论，对于文化交流的实质问题如交流的途径、交流的方式以及隐藏在器物特征相似的表面之下的观念、意识方面的互动等讨论较少。在此次研讨会上，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无论是文化交流的具体线路，还是观念和意识方面的互动，都有较为精彩、系统的论述，无疑为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了个好头。

不过，正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显丹、孙智彬研究馆员所说，在研究古蜀文明各个阶段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之时，不能“舍本逐末”，一味找寻古蜀文明形成、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外来因素，而要立足于对古蜀文明自身的深入研究，寻找内在因素。

三 聚落考古工作与研究

随着聚落考古理论在中国的流行，^[6]以了解聚落结构、聚落性质及其变迁情况为主要目标

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不断增多。具体到四川省，宝墩古城和三星堆古城就是开展聚落考古工作和研究较为深入、全面的典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唐淼馆员系统梳理了宝墩古城以往工作，结合历年勘探、发掘成果，在新的分期体系下讨论宝墩古城的聚落结构、生业方式和社会复杂化问题。他认为鼓墩子区域是城内规格较高的公共活动场所，田角林、蚂蟥墩和朱林盘等三处聚落点为生活区域。人群通常选择在台地营造房屋，墓葬分布无一定规律，大都在房子周围或者低洼区域以小型墓地的形态出现。^[7]整个聚落呈现出以家户为最小单位，普通家户以该区域大房子为中心的（氏族式）生活模式。

三星堆遗址从2011年开始纳入国家“五年工作计划”中，此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了解遗址的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而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考古工作和研究，冉宏林馆员对此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他认为三星堆城址为“一大多小”的格局，“一大”即外城圈，“多小”指位于外城圈内的多座小城，目前已经在北部确认月亮湾小城和仓包包小城。外城圈和两座小城共用北城墙。^[8]三星堆城址的营建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最初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晚阶段在遗址西北部建造月亮湾小城；之后于遗址第三期沿着月亮湾小城北墙和西墙分别向东、向南扩建，与三星堆城墙一起形成第二重城圈；于第三期偏晚阶段在城内东北部建造仓包包小城，并继续向南扩建东城墙和西城墙，与新建的南城墙合围成遗址第三重城圈。

尽管聚落考古工作在中国已经开展了超过30年，甚至可以追溯至姜寨遗址的发掘，但由于考古年代学的固有局限，“共时性”和“历时性”两大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更何况，如今的考古发掘很难将一个聚落完整揭露出来，任何关于聚落结构、聚落性质的研究都不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但是，宝墩古城和三星堆遗址的聚落考古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解决办法，二者都比较重视城墙、壕沟等线性遗迹，并据此划分聚落的功能区，重点讨论功能区整体的年代、性质及其变化，这些方法和经验将来无疑能够在聚落考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 科技考古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手段开始应用于古蜀文明研究,从最初的碳十四测年、成分分析,到后来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景观考古、环境考古以及体质人类学研究等。这些新内容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信息、新思路和新方法,为古蜀文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海兵副教授对高山古城出土人骨进行了综合观察、检测和分析,认为高山古城人群平均寿命很低,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成年人大多骨骼发育中等,强壮者较少;可以大体分为“古华南类型”与“古西北类型”两种人群;疾病类病理现象常见,牙齿磨耗重,有“拔牙”习俗,创伤类现象极少;食物以C3类食物(水稻)为主,C4类食物(粟黍)为辅;少量女性幼年期以C4类为主,到成年期及趋近死亡以C3类为主,反映出可能由C4区迁徙流动到C3区的迁徙路线。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闫雪馆员对成都双元村船棺墓地的葬具所属木材进行了鉴定,确认均为楠属木材。她认为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及周边低矮山地应分布有楠属,先民因此就地就近取材制作船棺,而葬具用材并不适合作为判定墓葬等级、墓主人身份等级的标志。

科技考古研究在如今的中国考古学中越来越被重视,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不过,以往有很多科技考古研究实际上只是利用考古出土的材料做了科技分析与检测,实质上还是自然科学研究范畴,考古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结合还不够深入、彻底。在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手段“为我所用”,放到解决考古学关键问题的核心途径的层面上应该是大势所趋。上面的研究应该是很好的尝试。

五 余论

两天的学术会议很快过去,大量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结论仅本文的寥寥数语实在难以全面总结,不过它们对于桂圆桥遗址及古蜀文明今后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古蜀文明源头的见证,我们需要响

应什邡文贤郭辉图的号召,彻底保护好桂圆桥遗址及相关古蜀文明遗存。

桂圆桥遗址面积将近3万平方米,2009年的发掘面积不足3000平方米,尽管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受限于发掘面积太小,诸如聚落形态、生业模式、社会结构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此,与会者均认为针对上述未解决问题开展进一步考古发掘显得十分必要。而在此之前,为促进桂圆桥遗址和古蜀文明研究的深入,系统、全面地整理2009年发掘的材料并编辑出版是重中之重。

目前“桂圆桥文化”只有桂圆桥遗址一处经过系统发掘的遗址,显然不足以支撑一支考古学文化,对于认识该时段以什邡为中心的沱江流域聚落形态及其变迁也形成了诸多障碍。因此,下一步还需要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桂圆桥遗址之外的其他同时期遗址,如箭台村遗址、鲁安村遗址、星星村遗址的再次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将“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附记:本文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江章华研究员在会上所作学术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各位学者的发言记录及演示文档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定,可能存在错误或偏差,请参考作者相关论文。

注释:

-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9期。
- [2] 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
- [3] 江章华、何锐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 [4] 陈德安:《古蜀文明与周边各文明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
- [5] 陈剑:《川西北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史前交通考述》,肖先进主编:《三星堆研究》第2辑,第179~19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 [6]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本文引自《考古学是什么》,第164~1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7] 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考古》2015年第4期。
-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马屁股城墙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7年第5期。